

李大钊与国民大会运动

刘国有

(天津公安警官职业学院 法学系, 天津 300382)

摘要: 国民大会运动是李大钊等领导的新兴左翼进步势力走上政治舞台的开始, 它为国会的重新召集、王宠惠内阁的推出创造了条件。同时, 李大钊等人也积累了经验, 为发动更广泛的进步运动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李大钊; 国民大会运动; 提倡临时国民大会启事

中图分类号: B26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349X(2018)02-0026-09

DOI: 10.16160/j.cnki.tsxyxb.2018.02.005

Li Dazhao and the Movement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

LIU Guo-you

(Department of Law, Tianjin Public Security Professional College, Tianjin 300382, China)

Abstract: The Movement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 was the beginning of Li Dazhao's leading new left wing progressive force onto the political stage, it created the conditions for the reconvening of the Congres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Wang Chonghui cabinet. Li Dazhao and other comrades accumulated experience from the movement which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broader progressive movements.

Key Words: Li Dazhao; Movement of National Assembly; Notice of Promoting the Provisional National Assembly

1920 年直皖战争结束后, 李大钊、白坚武、孙丹林等人在蔡元培、吴佩孚支持下提出了召开国民大会, 研究国家大政方针、停止内战、和平统一的重要政纲, 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社会团体群起呼应, 徐世昌、靳云鹏等北京政府的领导人也被迫作出回应, 这是李大钊等领导的新兴进步力量推动国家民主统一的重要尝试, 后因张作霖、曹锟等实力人物的反对而失败, 但它提出的民主统一纲领, 显示了新兴进步势力的力量, 为国会的重新召集和王宠惠内阁的推出创造了舆论条件。笔者搜集了较多史料, 意在准确厘定此运动的性质、演变及意义。

一、运动的背景与酝酿

国民大会口号的提出首先是基于对安福国会的广泛不满。1918 年 8 月, 在段祺瑞的支持下, 徐树铮、王揖唐等操纵下的安福部取得了新国会选举的胜利, 王揖唐、梁士诒分别当选众、参两院议长, 新国会选举徐世昌为总统。粤、桂、滇、黔、川五省则召集非常国会, 设军政府代理国务院摄行大总统职务。1919 年 2 月 20 日, 南北和会在上海召开, 但因安福党人的阻挠未有成果。1919 年 11 月 28 日, 曹锟下属的陆军师长吴佩孚与南方护法军政府代表陆荣廷、莫荣新、谭延闿等人在衡阳召开会议, 决定停

作者简介: 刘国有(1968—), 男, 天津宝坻人, 副教授, 主要从事法学和李大钊思想研究。

战。1920年1月17日，吴佩孚以前方经济困穷、官兵思归为由，要求撤防北归，遭到段祺瑞反对。5月25日，吴佩孚率军北撤，6月7日到达郑州。14日，吴佩孚致电反皖的八省督军，建议召开国民大会，得到张作霖的奉军的响应，这是最早提出的国民大会口号^①。7月，直皖战争爆发，吴佩孚率领直军在奉系援助下打败皖系占领京津，直、奉共同控制了北京政权。

李大钊及其北洋法政学校的老同学张则民、白坚武均可能参与了此事策划。张则民时任第一届国会稽勋系首领孙洪伊的秘书，他动员吴佩孚与南方讲和。白坚武本为江苏督军李纯幕僚，长期关注进步思想的传播和上海、北京等地的学生运动，深受激进思想的感染，与吴佩孚身边的重要人物孙丹林^②、李倬章颇有交往。1920年1月《解放与改造》上刊登的张东荪的文章说，中国“如果有建设，必定依著社会主义的原则”，白坚武认为这“是为我所欲言者”。1月2日，他与天津“各界联合会干事刘清扬便饭”。当天的《白坚武日记》（以下简称《日记》）写道：“在近日的中国尚在政治问题的范围中，一般官僚、兵头、土匪、强盗、乡愿、市侩结晶的一个政治污秽的不堪，要是不将这些东西用万死一生的政治根本洗刷法洗扫清楚，在这个世界的环境里头，那容你安安稳稳的讨论？”^{[1]229}“吾人认定群众政治为最终之目标，今之尸居余气之当局，罪恶虽有深浅，其为民贼则同也。”^{[1]231}2月4日，他说：“得粤讯，吴子玉约王汝勤^③、范国璋^④撤防。为吴计早应及时自决，过此以往恐有变生意外之虞。”^{[1]234}2月7日，他复信张则民：“复长函答所询各节，并余所闻诸人定诸胸者告之。”2月8日，白拜访了吴佩孚

亲信李倬章（济臣），“李倬章明日往保定，访谈送行”。2月26日，他接连会见了来访的北京学生代表和安福系国会议员，“京学界代表祁大明^⑤过宁往豫来访。叶剑星偕山东沙、杜两新国会议员来访，讨似是而非之法律论，末后归到奉鲁直宁之结合，不知其用意所在，余亦以迷离恍惚之语答之”。29日，他读了报纸时评后说：“《志林报》有巴克斯特氏投稿，详说徐世昌、张作霖、段祺瑞之暗潮近欲破裂，持公允之归论，取以毒攻毒之策。斯言也，余深谓然。”^{[1]239}3月6日，他“接李倬章来函1件，告京保状况”。这说明白坚武时刻关注着时局，与吴佩孚周围的人联系畅通。

1920年2月10日，白坚武读了《新青年》刊登的陶履恭《欧美劳动问题》对劳动者参与管理的介绍，深为赞赏，说它“朴实平允，很有道理”。11日，又说杜威的职业代表制“足有把握有效果，各行业各集合组织、各行业的团体公选议员，以代表各行业的利益，比较局外的人总强得多。……我看在中国这事一定要做的”^{[1]241}。3月15日，他拜访了李纯的外交顾问温世珍，“谈南北督军取消新旧两会事”。这是他的日记第一次出现取消南北两国会字样。21日，他注意到“报载段祺瑞往保定访曹錕阻吴佩孚撤防、解散八省同盟，回告徐有效”。4月11日，他说：“袁世凯之练兵小站，招集若许之棍徒无赖以作羽翼，虽至袁死，而其党徒尚拥有中枢以断送国运。今且内部自相溃乱，任在何方分割，其恶之成分均为相等。即以政治余沫论之，袁之党徒不死尽，实无澄清之望。”4月28日，白坚武会见了全国各界联合会代表，“全国各界联合会代表周剑秋来访，报告上海学界与军警冲突被虐

① 见《申报》1920年6月18日第10页《吴佩孚行动再志》。

② 孙丹林（1886—1971），字汉尘、汉臣、汉忱，山东蓬莱人，1904年考入山东大学，1905年加入同盟会，参与辛亥革命，并任山东军政府秘书长兼军事参谋，1919年，孙丹林前往湖南充吴佩孚戎幕，1922年任北洋政府内务次长、内务总长。1923年脱离政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文史馆高级馆员。

③ 王汝勤（1877—1939），字幼甫，直隶密云人，北洋将领，1919年9月任陆军第八师师长。

④ 范国璋，字子瑜，天津人，北洋将领。

⑤ 疑为祁大鹏。

待情况,并持函来见李督”^{[1]248}。5月9日,他接到李倬章来函,“陈保定会议内容”。10日,白即给李回信,“寄李倬章、张则民各1件。”这应该是白坚武对吴佩孚的最早进言,或即提出了国民大会建议。11日,他会见了前来接洽议和的广西代表黄鲁宜,并写信给李大钊,“此次代表陆干卿来接洽宁京,图南北收束,代表相望于途,足证陆之情急矣。寄李守常1件”。5月31日,他“收阅李守常”来函,6月2日“寄李守常1函”,10日,“孙伯兰请谈,商时局办法,张则民自鄂归,来访道吴子玉近况”。17日,他拜访了孙洪伊,“略谈京宁近况及吾人应付主张。10时半,访仇亦山^①,告湘局及各方态度,嘱转达前方”。6月27日,“以王幼侨君回汴之便,托交孙汉宸一函,孙为吴子玉总角交,往往可规劝也。函言时局利害特详”^{[1]261}。这里白坚武详尽剖析了时局与利害,为国民大会运动提出了若干具体设想,应是白与孙丹林、李大钊、张则民等共同讨论的成果。

7月6日,白坚武接到孙丹林的回复,说吴佩孚对他的建议极为欣赏,“吴子玉大佩余论,并坚约往助。子玉之为人实有担当,可与为善,惜奸人太多,恐被牺牲耳”^{[1]262}。1920年7月17日,吴佩孚通电反段,“吴佩孚发元、文两电讨段祺瑞。天津省议会、商会、各界联合会通电讨段祺瑞”^{[1]263}。7月20日,白坚武写信给孙丹林继续进言,“修函一件,托左霖仓带保交孙汉忱”。7月22日,吴佩孚宣言,“直皖和议,听总统主裁,善后大局,仍主国民大会解决”^②。

1920年7月27日,奉直双方在天津开会,直系除提出惩办安福系、解散边防军、直奉两军进驻京城以外,还有“与西南直接办理和议”、“解散旧国会,另办选举”共六项条件^③。吴佩孚则直接提出召开国民大会,“速集国民大会,

制定宪法,修改选举法,附录国民大会大纲于后”,国民大会“由国民自行召集,不得由官署监督,免官僚政客操纵把持”,宗旨是“取国民自决主义,凡统一、善后及制宪法、修选举法暨诸重大问题,由国民公决,他方不得藉口破坏”,“会员由全国各县、农工商学各会各举一人为初选,凡被选举人不必各本会为限,如无工商等会,宁缺毋滥,再由全国合选五分之一为复选,俟各复选完竣,齐集上海或天津,成立开会”,选举由各县农工商会长互相监督,官厅不得干涉,“三个月内成立开会,限六个月将第三条内各项解决即闭会”^④。这里选举程序的具体设计,应是由白坚武提出,或他与李大钊讨论的结果。张作霖、曹锟、靳云鹏等则提出另外的方案,“国会自行解散,依新选举法或旧选举法,召集第三次国会”^⑤。

1920年7月29日,张则民来南京向白坚武“详告保定、开封近情”。8月2日,白接到“孙汉忱自直军前敌长辛店来函1件,张则民自沪来函1件,寄复则民函1件”。3日晚“收守常来函1件”。4日,“寄李守常快函1件,并附介绍吴子玉1函”。这个“快函”应即建议李大钊发动学界运动。7日,他为张则民“索半价票2张,修函托带交孙汉忱,复前由长辛店寄函也”。8日的《日记》详细说明了发起学界国民大会运动的必要性:“筹计国民大会之法未尝不善,特在国民真力真意运用如何耳!军人而能以全力争组织国民大会,固亦愧死一般以爱国为表帜之政治家矣。余日来计国民大会有种种作法,然不从学界做起似无基本。吾人以国民大会办法涉于浑浩而遽处淡漠,未免间接助军阀官僚,扶扬其凶焰,故宜重思也。”白的建议有了结果,1920年8月15日,曹锟、张作霖发表联合声明,提议召开国民大会,“正式协商解散

① 仇鳌(1879—1970),字亦山,湖南湘阴人,此时应在湖南省政府任职。

② 《申报》1920年7月24日第3版《北京电》。

③ 《申报》1920年7月29日第3版《天津电》。

④ 《申报》1920年7月31日第3版《天津电》。

⑤ 《申报》1920年7月31日第6版《惩治安福罪魁之近闻》。

新旧国会”,“依六年选举法,组统一之新国会,明年四月朔为开会期”,“国会未开前,召集国民大会,讨论去年所交付沪会问题,至制宪归国会,不主交国民大会”^{[1]267}。8月17日,李大钊发表《要自由集合的国民大会》(以下简称《自由集合》),吹响了学界国民大会运动的号角。8月20日,白坚武接到张则民从李大钊住所发来的通告信,“接张则民自京后闸35号来信,告京情,即复1函”。这说明张则民很可能参与了《自由集合》与《提倡临时国民大会启事》(以下简称《启事》)的策划。8月21日,王文彬领衔,李大钊、蔡元培等署名的《启事》在《北京大学日刊》正式发表^①。

二、运动的主要事实经过

8月21日,李大钊等发表《启事》:

北京大学教职员学生,拟发起临时国民大会,以为正式国民大会之预备……自本月二十日蔡子民等十三人发出通告北大教职员学生公函后,进行甚为迅捷。至二十五日,署名赞成者,教员有一百三十余,学生几及六百(现留京者不过七百余人),乃由发起人开一会议,决以兹数百人个人名义公函于教职员联合会及学生联合会,请该两会邀集各校教职员学生意见,既得学界同意,然后开一临时国民大会发起会,以学界名义发起,再进行于各界。该两函已于今日送出,惟学生联合会,近因在暑假中,颇形停顿,在会学校四十余,非过半数代表到会不能开会,而今日开会,则最多时不过到八校代表,少者近四五校而已,请联合会宣传,其能力未免过于薄弱,故此数百赞成人,主张自行组织一筹备

会,以代学生联合会之宣传任务,于是有今晚八时(二十七)法科之会。上次开会,未尝发表于大学日刊,仅于三寄宿^②中当日发一通告,故到者仅二百余,盖居公寓中赞成者多半未知,亦有虽知而因时间问题不能到会者,延至八时四十分,见人数仅此数,乃开会,周长宪推王文彬主席,众无言。王遂就席报告经过情形……先由学生三四人、教员七八人开谈话会三次……及商议结果,王宠惠、罗文幹、蔡子民诸君,皆认为于开正式国民大会之先,有开一临时国民大会之必要,临时国民大会与正式国民大会迥不相同,临时国民大会为手段之作用,但将其所决请政府注意,至正式国民大会,则以其果为目的,必求政府实行之而后已。惟此次临时国民大会,不当如去年北京所开国民大会之简陋,其人数必求多,且求推行于全国……王言毕即请各人发表意见……为筹备发起国民大会之办事处之组织,内分总务股(会计庶务附)、新闻股(文牍书记附)、交际股司联络。周长宪君以为人民多有不明临时国民大会之意义者,主添讲演股,多数赞成,乃分推各股干事,推定每股二十余人至十余人不等。此时已晏,乃决于翌日在文科推各股正副主任,遂散会。(二十七日夜一时)^③

社会各界很快开始呼应。王宠惠、张一麐、罗文幹等发起的国民大会商榷会就曾多次开会,“筹备将近一月,前日在石驸马后闸勺园开第三次茶话会,商妥进行方法,推定临时职员,该会基础确已成立,从此进与人商讨,共策进

① 胡适、李大钊等署名的《争自由的宣言》与李大钊的《自由集合》分别于8月1日和17日在《晨报》发表,《宣言》虽提到国民监督选举,却丝毫未提及国民大会,似说明李大钊等在此前尚未决定发动。因此,李大钊的动意,应在8月初以后。

② 应该是北京大学第三寄宿舍,又称三斋,位于译学馆北侧八旗先贤祠。

③ 《申报》1920年9月1日第6版《北大学生发起临时国民大会筹备会》,有确切资料说明,王文彬后来是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但其何时入团,尚无准确资料。1923年5月的一篇报道说:“五月十日下午八时,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大第二院大楼第二教室开秘密会议,有李大钊王文彬刘仁静等约四十人,公推刘仁静为主席,张国焘为书记。”据《益世报》1923年5月22日第7版《吴佩孚否认严办学生电》,孟寿春则可能是李大钊等发起的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成员。

行,以期国民大会早日实现”^①。也有报道说,国民大会在8月初开始筹备。“京学界又为全国学界之中心,得风气先,为全国倡,舍之固莫属也。在三星期以前,吴东电^②尚未发,外间即有开国民大会以解决时局说,北京学界同人,如蔡子民、孟寿春、王文彬、陈启修、李大钊、谢绍敏等数十人,即会于中央公园来今雨轩讨论兹事,到者以北大教职学生为多,而法政学校学生亦有参加者,此次茶话会之结果,主张对临时国民大会发表数种提案,以征求全国民意,当时讨论提案之办法,有主张以团体名义发起者,有主张以个人名义发起者,曾略有讨论,其结果则多数以为用团体名义,反不足以动个人信仰,故决用个人名义,讨论颇久,限于时间,未得结果,其后复开茶话会二次于北大文科,将个人所提案详细讨论,其初合个人所提之条件,共得二十余条,厥后次第并合裁汰,成为七条,众谋僉同,乃由孟寿春于每条加以说明而发表之。……此提案由北大教职员学生十三人具名油印,于八月二十日函该校教职员工征其同意,俟众议僉同,乃通告京内外各学校及各界团体。”^③“此函既公布,北大教职员学生及毕业生皆促起注意,一时引为讨论问题者颇多,多数对于此七条提案以为皆人心中所欲言者,甚表同情,故从函之要求,亲笔署名、注明地址,交汉花园北大收发课者,一时颇形踊跃。五日以后,当可开大会讨论。虽少数消极者以为国民大会恐不易告成,而对之不起何种感想,然在学生教员中为绝少数,无损于此事之成也。惟对于此七提案,尚有以为当增损者,如中国大学教员刘子任等(北大毕业生),则主张于第一条之下,附加反对现时之阶级选举制,主张以普通选举召集新国会,已

具理由书送北大第一院,彼曹又先组织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之讨论,曾在《新中国》杂志社及中国大学开会数次,以后当与北大之会合并讨论,京学界于国民大会一举,固正在竭力进行中,各省亦能同时并进以表献民主之真精神否?”^④

运动发起时,北大正在暑假中,很多师生不在北京,所以参与人数不是很多。“北大发起临时国民大会,其发起人等,以日来收集校内赞成书函,已有六百余起之多(该校全体二千余人,现因暑假回籍者居多,留京者仅七八百人),爰于前日晨九时,复在该校第一院开一会议,到者约七八十人,讨论结果,决定将上次公函内所拟征求校内同意后,再用全体赞成人个人名义,通告京内外各学校及各界团体办法,改为先以该校全体赞成人名义,通告京内各学校,俟得同意,再通告京内各界,征求同意,然后通告京外各学校及各界团体,其通告京内各学校书,不日即可发出。”^⑤

1920年9月2日,北京各界在北大第二院开会,讨论北大学生提出的国民大会草案,“北京学生联合会,于二号在北大第二院,邀请各界,开国民大会筹备会”,到会者有北京教育会、农会、京兆教育会、报界联合会、律师公会、基督教徒救国团、女学界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等九大团体,代表韦琼英、王孝英、孙淑贞、吴景芬、李静一、刘芳、俞明濂、沈士远、傅柏山、梁锡光、史照泉等二十多人出席会议,“由主席报告开会宗旨后,各代表先后发言,均一致赞成,并表示极满意态度,已将草案携回,分头讨论”^⑥。9月3日,北大学生会拟出国民大会草案交各界讨论。9月9日晚,北京各团体代表在北大理科召开

① 《申报》1920年9月19日第7版《国民大会商榷会宣言书》。

② 似应为8月1日吴佩孚发出的召开国民大会的公电。

③ 由此可见,七条政纲为公议后由孟寿春归纳而成。

④ 《申报》1920年8月26日第3版《国民大会与京学界》。

⑤ 《申报》1920年8月30日第7版《国民大会消息》。

⑥ 《申报》1920年9月6日第6版《北京各团体筹备国民大会》,9月12日第6版《北京通信·京各界联合会成立会记事》(吹万)。

国民大会筹备会讨论会,宣布成立北京各界联合会。汇文大学学生林宝慈主持会议,北京各团体代表刘芳^①、沈士远^②、王孝英等出席会议^③。9月10日下午,北京各团体决定先组织各界联合会,再开国民大会筹备会,简章由学生会起草,“以发展民治为目的”。出席会议的除各高校学生组织外,还有《晨报》《益世报》《京话时报》等报纸、通讯社以及各团体代表,林宝慈、鲁士毅、彭翼仲^④、成平^⑤等代表发言,彭说“国民大会之进行,急不容缓,吾辈人民,须先行统一起来”,《晨报》代表陈君“主张北京报界,宜设立一种联合团体”,成平则说“个人赞成国民大会之意旨,并言时间宜宝贵”^⑥。

1920年8月7日,天津各界联合会发表通电:“请曹张吴主持,速开国民大会,严拿老段小徐等,俟国民大会成立,组特别法庭治罪……解散新国会,依元年选举法改选议员,俟国民大会成立后,再依法成立新国会。”^⑦1920年8月21日,上海工商学界组成的国民大会策进会成立,“到会人数达一千数百余人,均系上海工商学界健全分子,气象严整,南北市各大商号,多悬国旗,足见国人对于国民大会,已具有自动的决心”^⑧。29日,上海沪北六路商界联合会公电

响应,高度肯定北大师生提出的倡议:“京学界对于国民大会一则,盍诵之余,钦佩莫名,提案七条,言简意赅,语语中肯,深合共和国之主旨,此皆人民心理中所欲言而未言者,将来即有主张增损,然究不能越此大纲要领也。诸君当全国学界之中心,又克尽先觉觉人之天赋,做四万万民意之先驱,凡属国民,当无不同声赞可。敝会本拟日内召集全体职员,将该案征求同意后,始行函答。但仆等渴极思饮,早极思雨之诚,譬诸一遇甘霖,未有不惊喜欲狂者。何况芝草丰泉,牧豎咸知为祥瑞;庆云佳日,愚人亦识为清明耶!为特不揣冒昧,先此驰函奉答,表示赞同!”^⑨9月初,上海地方自治研究会副会长吴叔田等发起国民大会筹备会。1920年9月3日,安徽成立国民大会协进会,准备派代表进京。蒙藏各王公,包括外蒙古王公也积极响应,“东海今接蒙藏各王公、车臣汗……及辅国公等代表蒙藏全体来电,表示赞成国民大会,并请加入代表,闻中央因该会办理手续尚未规定,故未答复”^⑩。9月26日,天津召开国民大会辩论会,“正派为李仲吟、王卓忱、时子周,反派马千里、刘清扬、刘激清,以二人为一组,互相辩论,

① 似应为著名教育家刘芳牧师(1876—1965),字馨庭,参与创办天津、北京等地汇文学校,与冯玉祥等关系密切。又有说刘廷芳,亦与冯玉祥关系密切,“北京女师大的刘廷芳也在做冯的工作,要想使他做基督将军,为教会成立一支军队,用教会的钱或美国政府的钱援助冯玉祥,想借冯的力量扩充教会的势力,哪知冯的势力起来后,却受其妻李德全的影响,被左派拉了去。”——《汪崇屏先生口述历史》,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27页。

② 沈士远(1881—1955),著名学者,庄子研究专家,时任北京大学教授。

③ 《申报》1920年9月12日第6版《京各界联合会成立会记事》(吹万)。

④ 彭翼仲(1864—1921),北京资深报人,1904年8月创办《京话时报》,1906年9月因“妄议朝政,容留匪人”被流放新疆,民国后回京。

⑤ 即成舍我,时任北京《益世报》总编辑。

⑥ 《申报》1920年9月13日第7版《学生筹备国民大会与报界联络》(平心)。

⑦ 《申报》1920年8月9日第3版《天津电》。

⑧ 《申报》1920年8月22日第10版《国民大会策进会成立会记》。

⑨ 《申报》1920年8月29日第10版《赞成京学界国民大会提案函》。

⑩ 《申报》1920年9月4日第3版《各方面对于国民大会之主张》(吹万)。

莅会者约四千人”^①。

梁启超等立宪派领袖也很感兴趣,据说梁“之主张为公民数万集合制宪,张^②之主张为由省议会各出二代表制定国民大会组织法。此外若南方一派政客,如政学会派,则已表示怀疑态度,各省名人,大率默无一言,又有一说,谓熊梁张汪诸人,近在津门迭开会议,对于此事,将为精密之研究,不久即有宣言书发表”^③。

三、国民大会运动的主要内容

对于国民大会,吴佩孚的设想是以职业团体为基础的复选制,但社会反响不大。“吴佩孚及其友人已提议组织一国民大会,由各地方之人民直接举出代表组之,其法由各大埠之学农工商团体各举代表一人,于全体代表中再选五分之一为大会会员,此会之职务,则为议决一切关于巩固民国之问题,如统一南北、制定宪法、制定选举法等,可见其权力极大。若果能代表真正民意,则中国民治主义政治之基础,从此确立矣!自吴佩孚表示此主张后,国民响应之声极弱,只有学生及法律家之团体表示赞成,然兹事体大,苟非国民一致主张,不易成功!彼官僚武人已在竭力打消此计划,冀得为所欲为。”^④

根据1920年8月17日《晨报》发表的李大钊《我们要自由集合的国民大会》,国民大会运动首先是人民起来集会,制定基本政纲,“把目前解决时局的办法,简单而且重要的标出几条,交给南北政府去办”。“我们全国的市民,要随时到处自由会合,取应有尽有的手段,作我们的运动,非达到目的不可”。其次是要废除安福国会,“安福国会是非法的东西,当然无效。旧国会时期经过太长,中更迭次变乱,其中分子早已七零八落,不足以代表我们了”。还要发布人权宣言,把公民

权利法律化,“我们还要本着自由、平等、博爱、互助、劳工神圣诸大精神,发布一种神圣的民权宣言”^{[2]210}。具体方案则为《启事》提出的七条政纲:

1. 同时解散南北两个国会。“解散非法国会,并不承认非常国会继续存在。”

2. 惩办安福分子,不得启用复辟帝制犯。“安福祸首虽经拿办,而平日依托党籍卖国自肥者,亦应分别惩办,以儆效尤。……复辟帝制犯,均罪在不赦,永不得再行启用。”

3. 裁减军队,废除督军等类似的制度,即“与督军同等制”。“督军、巡阅、军区长以及其它同等军阀制度,均应一律废除,以符民治精神。”

4. 保障公民权利。这里的公民权利,是指《约法》即1912年南京《临时约法》上规定的“身体、言论、出版、集会一切自由,均得绝对的保障”。

5. 地方自治,允许地方“编练民团”即地方武装。

6. 公布国家“会计”,即政府财政公开,禁止秘密借款。“岁出岁入亟应公布,预算决算,亦须依法办理,并严禁秘密借款,以防贪冒。”

7. 实行民意外交,“根据民意决定外交方针,并取消一切卖国密约。”“所有二十一条与军事协定以及其他卖矿、卖路一切密约均取消之。”^[3]

这就是后来作为各地讨论基础的国民大会运动七条政纲。大体看来,这是一份民主、法治、民族略带左倾色彩的政治纲领,并没有激进的苏维埃因素。

1920年8月22日,国民大会发起人发布筹备设想:“决仿筹备国会例,设国民大会筹备处,(一)会期以三个月为限,地点在北京;(二)各省设分处;(三)议程听民意支配。”^⑤根据北京到上海鼓动人员透露的消息,国民大会大致

① 《申报》1920年9月28日第6版《北京电》,同日第6版还有筹备会消息。李仲吟为1912年成立的天津工党评议主任,1925年国民会议运动时也有所活动。见天津《民兴报》1912年6月13日第7版《工党开会》。

② 张,即张一麀(1867—1943),字仲仁,江苏吴县人,著名爱国人士。

③ 《申报》1920年8月14日第7版《北京通信·国民大会声中之各方面》(静观)。

④ 《申报》1920年8月18日第6版《大陆报论国民大会·国民速起·弗失良机》。

⑤ 《申报》1920年8月23日第3版《北京电》。

是各省民众自行提名候选人,然后由省议会推选。“自北京来沪学界某君,邀集名流,假大东酒楼集议,对于国民大会,互有讨论,大旨拟由各省分别组织国民委员会,选举代表,每省五十人,以投票多数者一律在各地报纸发表,俟人民公认后,再交各省议会互选,依照法定人数,选出各省代表。”^①1920年9月26日,北京各界联合会在北大开会,决议发布宣言,“表示以发展民治为宗旨,筹备国民大会为最重要目的”^②,并劝导京总商会加入。

四、政府冷对与奉方的打压

国民大会运动声势之大,直接影响了当时的政府。1920年8月,总理靳云鹏发表谈话,不赞成召集国民大会,“国民大会,为超越法律范围之举动……不得已之举动也。大乱之后,纪纲毁坏,不得不以国民大会救济之。今者政府犹存,秩序未乱,纪纲法律,浸以颓弛则有之,未至失效毁坏之地位也。政府从而整饬之,自有正轨可循,不当诿其责于国民”^③。不久,他又说,如果国民大会要编订宪法,则可以召集,“若国民大会既可召集而为国民之真正代表,则未尝不可用同样方法选举国会而亦可为国民之真正代表也。……政府现正考虑依照宪法召集新国会。政府固不欲发令更改法律,但有若干小节,颇生困难,国会三次失败,未能编定完全宪法,而国民以为宜于新国会开幕以前召集国民大会,以决定极关重要之宪法,盖政府能遵守宪法,则国事定矣”^④。但运动让靳内阁和保守势力十分害怕。8月底,靳内阁发布命令,禁止军警和司法人员参与:“当局对于国民大会之组织,异常慎重,盖恐各政客怂恿利用,再起绝大政潮。闻已限定以下各项官吏不准加入……凡

在职之司法官吏,不得加入团体……军界自目兵以至高中下各级军官,警界自警士以至警监,均不得加入。他如各官署供职人员,亦在禁例。闻此会将纯由公民团体组织,惟各省之议会,不在限制之内。又据最近曾谒见东海者所谈,谓国民大会问题,乃一种自然之潮流,既为民意所归,当局自无反对之理。在各方面意见未尽一致以前,东海尚不欲具体表示其态度。惟谓今后之政治,中央集权,势所难行,不如顺其潮流,扶持民权,共负国家之责,故颇认地方分权之制为较合时宜云云。”^⑤

张作霖则大肆攻击运动有国外背景,“国民大会,非可为问题也。该会系吴子玉所主唱,然其背后,有某国人煽动操纵,吴氏不过为傀儡耳……就中国现状观之,此事万不可能,余昔与吴氏会见之际,大有所论,业已劝吴氏中止其计划,此计划恐属不成,曹使对此事,颇不明瞭!”^⑥曹锟附和吴佩孚也不过是敷衍,“国民大会,自吴子玉提倡而后,全国响应。而头脑稍陈旧之旧官吏,则且持民气不可纵令嚣张之说,反对斯会。故在吴氏通电未发以前,非特靳张反对,勒令勿发,即素信吴言之曹仲珊,亦主张当取慎重,暂缓发表。逮吴电既发,曹挽救无术,为顾全吴颜面计,遂不得不稍变其前此主张,及靳徐二人,亦以为吴于此次战争,劳苦功高,所求止此,乃靳而不允,未免与吴以太难堪,以是国民大会虽为诸有力者心中所反对。而迄今日,乃尚有一线生机,内阁总理全权筹办,以部员为筹办专员之官办大会,政府方将谋其实现以敷衍吴氏,然吴氏之意,本主由人民自动,非主开官办之国民大会也”^⑦。

1920年9月10日,曹锟领衔19省区长官,

① 《申报》1920年8月29日第10版《国民大会声中之所闻》。

② 《申报》1920年9月7日第6版《北京电》。

③ 《申报》1920年8月18日第6版《靳阁之国民大会观》(深)。

④ 《申报》1920年8月29日第6版《靳总理之谈话》。

⑤ 《申报》1920年8月30日第7版《国民大会消息》。

⑥ 《申报》1920年8月18日第6版《张作霖与日记者之谈话》。

⑦ 《申报》1920年8月26日第6版《北京通信·国民大会与京学界》。

呼吁以现行选举法选举新的国会,组成新政府。当天下午,吴佩孚致电云南都督唐继尧,呼吁他支持国会重新选举。“新国会血统未明,违法组织,当然不能存在。旧国会分子凌乱,自行瓦解。且八年制宪,毫无成绩,已失国民信仰。……为今之计,若能以旧选举法选举正式国会,国会成立,行使约法职权,则于法律、事实均得平衡,一面可达护法之主张,一面可谋国家之统一。北方对于此说,尚多怀疑,麾下如以为可,佩当竭力疏解,以贯彻和平统一之夙愿,是否有合弟意,尚祈速复为盼。此电发后,另电湘潭延闾,转电西南当局,征求同意。”^①9月11日,奉直各巨头在天津召开会议,吴佩孚极力陈说民意的重要,与靳云鹏发生激烈辩论。“吴佩孚力言民意须尊重,靳谓今只有武力可言,譬如君不胜段,结果亦如小徐,吴历引古今中外事,以伸己说,雄辩历两小时。又因和局,吴与交叶^②辩论尤烈。”^③1920年9月11日,十九省区长官,推曹錕领衔,复滇唐黔刘有电:“大要主以旧法选新会解决法律问题,其他外交、裁兵、废督、自治四项,只须和局有成,统一政府组织即归办理。”^④9月12日,白坚武到保定见到了受挫后的吴佩孚,“偕李倬章访子玉将军,道代表等来意,并代定答语大意。然因渠天津一行受恶官僚及政学会疫气,外感殊为隔膜,力持旧约法召集新国会之说,余开导再四,尚未彻底明白。宵小之崇,误人正复不浅。……拟函1件,重为劝告”。13日,他把呈文递交吴佩孚,才让吴“意乃转,对客有根本之言。……同王励斋访孙禹行,闻曹仲珊更昏迷不得要领”^{[1]272}。9月16日,白坚武到京,住进李大钊家。18日,他“寄李倬章快信1件,内附吴子玉将军1函,作最后之忠告”。22

日,他感叹道:“曹、李昏迷,败不足惜,当局中之可惜者为吴佩孚耳,然知而不为与不知等。”²⁴日,“孙汉忱到京,余畅叙吴子玉近日内情,晚宴之于瑞记饭庄,约李守常、王励斋作陪,王未到”^{[1]274}。

1920年9月17日,吴佩孚对学生代表说:“国民大会,须各省自动,不宜在京,致为政党利用,代表仍由各县工团选出,议题以解决时局为限。”^⑤10月10日,白坚武走访了学生领袖祁大鹏等,“访宋唯民^⑥、祁大鹏,谈国民大会之作用”^{[1]277}。虽然白仍为之奔走,但运动已失去了上层支持,走向了末期。1920年10月30日,北京政府下令,按照民国元年国会组织法,重新进行国会选举,“和平统一善后各端,亟欲次第施行。国会为人民代表,关系极重,所有参众两院即从新选举,着内务部依照元年八月十日公布之《国会组织法》暨《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督同各省区长官,将选举事宜,迅速筹妥办理”^⑦。

国民大会运动没有成功,但它是李大钊等领导新兴市民和学生运动的开始,是新式民主统一的有益尝试,也为国会的重新召集和王宠惠内阁的上台作了舆论准备。

参考文献:

- [1] 白坚武. 白坚武日记[M]. 杜春和, 耿来金, 整理. 南宁: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
- [2] 李大钊全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210.
- [3] 李大钊全集: 第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356-358.

(责任编辑: 夏玉玲)

① 《申报》1920年9月11日第3版《北京电》。

② 疑为叶恭绰(1881—1968), 字裕甫(玉甫、玉虎、玉父), 生于广东番禺, 民国后历任交通部路政司司长、交通部次长、总长、交通部长等职。

③ 《申报》1920年9月12日第3版《北京电》。

④ 《申报》1920年9月11日第3版, 《北京电》。

⑤ 《申报》1920年9月19日第2版《北京电》。

⑥ 宋介(1893—?)字唯民, 山东滋阳(今兖州)人, 中国大学毕业, 中共北京党组织早期发起人。

⑦ 《申报》1920年10月31日第6版《北京电》。